



项坤三

Xiang Kunsan

项坤三 内分泌代谢学(糖尿病)专家。1936年2月21日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195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任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教授等职。率先在我国开展糖尿病分子病因学研究。建立了中国首个糖尿病家系及患者样本库;首先发现中国人线粒体基因突变糖尿病患者,并将基因诊断技术用于临床;通过全面筛查发现中国人 MODY 基因突变家系;对复杂病型 2 型糖尿病进行群体关联及家系连锁分析以及发病机制研究,阐述了中国人肥胖病和代谢综合征的特点。研究成果有助于完善临床糖尿病诊断及防治体系。获国家、省部级及市级科技进步奖 19 项。2003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除了经过充分准备的讲演以外,我平时不善言辞,亦不善用文字表述。我的人生历程平淡无奇,在回忆历程中组织内容,冥思苦想地竟不知从何处说起。“院士自述”约稿对我竟成了难题!时值盛夏高考时期,报端不时登载着有关高考的新闻,在阅读中倒勾起了半个多世纪前我由高考开始走上医学专业道路经历中的回忆。

每个年青人对未来都会有绚丽的憧憬。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高中期间,我亦在织造自己的前程之梦。那时建国不久,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大多数同学的大学报考志愿是

学理工科。我亦不例外,想学土木建筑。理由简单之极:国家建设需要大兴土木。1953 年填写高考志愿表的当天,需要先进行体格检查。我从小瘦弱,体魄不健,体格检查时医生说我有“平脚”,不能学土木建筑,理由是“平脚”不能胜任日后建筑专业中的“到处奔波”。一分钟的检查竟打碎了我的前程美梦。面对着高校报考志愿表,我不知所措地从不需用“平脚”“到处奔波”的专业中思索选择,亦受到同学的建议,我匆匆填写了我的志愿:医学专业。就是这样,我选定了我的终生事业。当时高考录取名单公开登载在报纸上。在 1953 年 9 月 29 日的《解放日报》上登着我被正式录取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曾名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学生。

回顾过去,我非常庆幸得以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个中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医学高等学府。2005 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中对上海第一医学院(创立时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创始人颜福庆校长有这样的评价:“在中国医学界没有一个人像颜福庆那样,不计名、不计利地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他对自己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文汇报 2005 年 9 月 23 日)。颜校长身体力行,以自己影响着当时有 16 位一级教授济济一堂的医疗教学群体,并由此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学生。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大学时期及嗣后 60 年代的研究生岁月中,除了学识增长外,更重要的是浸润在这么一个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环境中,使我深切地受到师长们的人格魅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的专业历程中永远地指点着我,要对中国医学事业做出奉献且不计名利。

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授中,接触最多的是内科系内分泌代谢病学专家钟学礼教授。他是我大学四年级时临床内科学的主要讲授教授,亦是我研究生学习时代的导师。钟学礼教授在扎实的内科学学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专攻当时

在内科学中不受重视,尚在发展中的“年青的”内分泌代谢专业。在 23 堂临床内科学课程中,钟学礼教授负责 12 堂课程的讲授,内容涉及普内科的“发热待查”,还涉及消化、心血管、肾脏各系统疾病,当然亦涉及了钟教授的专业内分泌代谢系统。现在重温我当时记下的课堂笔记,仍然使我惊叹钟教授内科学知识的渊博。他讲授的内分泌系统中的肾上腺疾病更引领着我第一次登入内分泌代谢专业的“殿堂”中观望,使我赞叹当时内分泌代谢病学的发展步伐和速度。

1958 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内科医师。工作之余阅读了内科各系统书籍,其中有一本书进一步引起我对内分泌代谢病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本书是由中国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刘士豪教授编著的《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在该书的序言中,刘士豪教授说该书旨在提供生物化学“理论基础,作为更好地了解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疾病的依据”。刘士豪教授在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及基础研究上有诸多建树,尤其是钙磷代谢及代谢性骨病研究中蜚声海外。在该书中,他就糖尿病、肝功能、肾病、钙磷代谢及内分泌病等以疾病发生及发展中的生化机制解释临床问题,循循善诱,步步深入,引人入胜,使我对内分泌代谢专业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将该书置于案头,不时翻阅。刘士豪教授的书成了我确定以内分泌代谢专业作为我的医学发展方向的引路者。在此基础上,我阅读了当时可能找到的或借得的国外出版的内分泌代谢专业书籍,并盼望有朝一日能有深造的机会,尽管当时自知是非常渺茫之事。

谁知机会在 1963 年突然来临,当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考取了母校钟学礼教授内分泌代谢专业研究生。在研究生制度普及的今日,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呈昙花一现的研究生制度的珍稀,不但招生名额屈指可数,而且报考或被录取都有多方面的限制。事后我才知道,是钟学礼教授看了我的考卷后要了我这个在某些

方面无法与别人相比的学生。因此我极为珍视这次深造的机会,夜以继日地享受着每一分钟的学习机会。但是好景不长,我在健康上右眼发生严重玻璃体出血,学业上亦因“文革”而中断。

以后,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我能做到跟随着内分泌代谢专业的前进的步伐,并且坚信在我国发展内分泌代谢专业的时机到来。终于在 80 年代我通过考试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得到出国进修一年的机会。我根据了解的专业动态,经过仔细思考和分析,认为糖尿病将成为我国内分泌代谢病中最为关注、最为影响健康的疾病;认为尽管研究难度很大,对糖尿病病因及发病机制认识上有了进步,方能推动糖尿病临床诊疗预防上的改观。我决定了进修的主攻内容,选择了当时不为国内重视的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在国外,所在进修大学对我要求跟随当时在糖尿病病因研究前沿的学者学习的能力有所疑惑,并对我回国后能否进行这方面研究感到怀疑。但是,学校当局在对我的学习能力进行考验后,还是对我的执著进行了妥协,满足了我的要求。这又是一次能日以继夜地享受每一分钟学习的机会。进修一年后又延长了两年回国。回国后开展工作中确实遇到远未料及的困难。1988 年,我们小小的研究组在一个仅 6 平方米的房间中的一个不到 1 平方米的水泥台上进行了第一个糖尿病分子生物学实验。现在距离这第一次实验已很多年,过程中有进展中的艰辛,亦有成功后的喜悦。

我的人生历程是平淡无奇的。在回首当年我的医学专业发展的起步过程时,感到师长在学术上的教诲及在人格、道德上以身作则的榜样,尤其是后者对我的影响是无穷尽的。他们的讲授使我的专业学识成长而他们的无言教诲则使我的道德品质完善。我对师长们无限怀念,无比感激。

这是我人生经历中值得回忆的一页。